



SHUIFENG CONGSHU

世纪风丛书

包亚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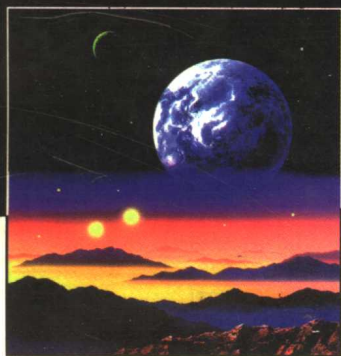
从“红玫瑰” 到

“红旗”

“红旗”

从“红玫瑰”

二十世纪



学人批评文丛

韩毓海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从“红玫瑰”到“红旗”

韩毓海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丛书策划 唐继无
责任编辑 唐继无
装帧设计 王月琴

从“红玫瑰”到“红旗”

韩统海 著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开本	850 × 1168 1/32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张	10.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千字	282 插页 2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次	1998 年 6 月第 1 次
		印数	1 - 5100

ISBN7-80613-536-7/G·596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1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传统”与“现代性”	13
1915:复辟时期的文化界	15
中国现代性修辞方式的建立及其批判	
——以严复和章太炎为例	25
春花秋月何时了	
——鸳鸯蝴蝶派与文化生产的近代兴起	45
几度风雨海上花	
——新感觉派的兴衰与中国的现代性	64
“大悲”	
——“民间社会叙事”的失败与张爱玲小说的	
意识形态性	84

什么是反思的知识和知识分子	103
“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	
——近代民主观的兴起及其批判	112
跨越“传统”与“现代性”的努力	
——再论近代中国的“启蒙”观	123
现代汉语的历史形成与中国的现代性	136
规则的转换	
——“文学独立”话语的近代形成	147
文化研究与反思	159
“历史进步”时代反思的可能	161
“中国”,一个被阐释着的“西方”	
——“跨语际实践”与当前文化研究方法论问题 ...	169
当前的文化阐释及其问题	186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问题	199
王朔与当代文学的转型	
——90年代“市民社会”话语的反思	215
杰姆逊的误读	
——评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及“第三世界”	
文化理论	240
从文学史到思想史	248
理论还有什么用?	277
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	286
学术晤谈	291
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	
——与周锡瑞对话	293

清华问学录

——与郑敏对话 303

毛泽东思想与第三世界的现代性

——与李旭渊对话 318

后 记 327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像大多数在学院里成长的人一样,我曾自以为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学生和信徒。根据一般的理解,自由主义的原则并不是一种观点,一种立场,而只是在什么是“好生活”面前保持中立的态度,它主张在保证所有人“公正”的参与社会方面,持“不干涉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的立场看上去好像就是“没有立场”。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当代生活中,今天许多人已经退入

“私人领域”，参与“公众领域”的批判热情和思想力量已大为减弱。于是，当1996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撰写了一篇批评当前学术（科）体制的文章后，结果仿佛是羊群里蹦出了骆驼——不仅是我所在学院的知识分子干部忙于把我推出去“献祭”，显然，自由主义者们也认为知识分子越出“圈子”参与公共事物，哪怕是在“公共性”的杂志上发表过激文章，从根本上有违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而实际上，今天自由主义者们可以坐视遍布世界的权力与大资本的结合，为这种结合所造成的高度同质化的控制进程大唱赞歌，嘴里说的却是：“不干涉主义”。自由主义者声称依据普遍性的原则进行有限的参与，但是，他们从来拒绝反省：这些普遍性原则，包括学术规范、学科体制、学术等级制度和文化生产所塑造的“发言权”，它们的普遍性是由谁来制定并提出的？事实上，借助普遍、中立的“学术规范”，自由主义一直力图制造一种“客观的”永世长存的知识审查制度，从而把一切探索和差异性作为“非正常的”因素排除出去。

尽管今天自由主义越来越有市场，但是我依然很怀疑：自由主义的那些从未经过反省的、与近代自然科学的机械论密切结合的现代性的“普遍性原则”，能够为当今世界人们的“自由交往”提供普遍性吗？如果说，所谓“儒教资本主义”的“东亚奇迹”的特点正是权力与大资本的结合，“大众明哲保身主义”的公众冷漠和知识分子的官僚化的话，那么，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也不能回避财产权、种族、性别、语言、社群等问题的挑战。

因此，我今天可以负责任地承认我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总是力图通过伪饰自己的“客观”、“中立”、“没有立场”来掩盖其真实的立场。

我为自己选择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疏离肉体的工作。与许多艺术家和其他劳动者不同，对我来说，大脑的运行并不总伴随着

四肢令人愉悦的律动。相反,不知从何时起,我会从早到晚,脑子里只充满了一个问题。每当此时,我就会表现得仿佛对周围的世界心不在焉,最经常的是,总是会失手打碎或丢失什么东西。问题还不仅仅是感性资源的偏枯,当一个人把自己封闭在精神和心理的运动之中时,浩瀚如水的疲惫会造成灰色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不愿在我“写东西”的时候搭理我。因为那时无异于面对一根抑郁的木头。

今天想来是准备高考的两年使我告别了打架斗殴翻墙爬树的少年生涯,“老老实实”地坐在了书桌前,从此一坐就是 20 年。我目前从事的工作是编一部百年“私生活史”或“感性生活史”。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与“文明风俗”的确立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对“体育”或“健身”的强调,卫生制度的形成。在我读大学期间,最重要的课外活动是“体育比赛”和“全民文明礼貌月”的打扫卫生活动。好像 100 年前的改革是从女子“放脚”开始,80 年代的开放是从“跳舞”开始,90 年代的“公关”已经由一般的“吃饭”变成了对于欲望生产的“包装”。问题不仅是对“身体”的关注说明了什么,而是在这个日益感性化的世界里,“身体”被从私域中拎到了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商品生产制造和引导着欲望和身体的消费。

我小时候曾经种过菜。因为我的父母虽说是知识分子但在“文革”中也无所事事,种菜园子算是劳动改造并且可补充家用之需,所以我知道真正“出污泥而不染”的是黄瓜而不是荷花,因为你用洗过鱼的水浇它它也会死。而不知从何时起,所谓吃饭已经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变成了公共的“社交活动”,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各种聚会是由“吃饭”构成的。城市社会的兴起与家庭的衰落同步进行。我们的“五四”前人曾把专制独裁统治看成是家庭组织的手段和家族制度的结果,而现代社会却是一种

无人统治,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过,“这个所谓‘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人格特征而中止其统治,它既代表着沙龙里的上流社会的假定的意见一致,也代表着整个社会在经济方面的一致利益……无人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无疑,在某些特定情势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暴虐的统治”。今天,开饭馆可能是绝对买卖兴隆的职业,餐饮业的兴起代表着我们时代的秘密,追求经济利益的一致性造成了广泛的胃的奴隶和感官的奴隶,对经济利益的顺从也造成了普遍的社会顺从性格,而在80年代,即使是那些本质上最温驯者也追随着“反叛”的时髦。所以,当我在华盛顿的波特马特河的游艇上聆听福山(F. Fukuyama)讲演他的“历史终结论”时,我同时发现船上给所有的人提供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午餐。而对我这种种过黄瓜的人而言,“无人统治”和“历史的终结”不过意味着美式快餐(American Fast Food)的统治而已。

我个人经历了两次知识的大变动和大转型。一次大转型是“文革”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它与全球性的对激进和革命思潮的反思相呼应,贯穿了整个8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苏东巨变引发的世界历史的深刻变动表明:知识和话语如何回应着现实的变化,同时知识和话语又如何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现实和历史。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进入了市场一体化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当下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特别是在我读书求知的8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特别是社会主义实践遭遇到的鲜明问题,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一直被隐藏着,而今天,随着市场对全球的一体化的笼罩,自由资本主义及其问题开始浮出地表,并以一种全球化的面目呈现和暴露出来。而随着

对这个世界的重新审视,整个知识目前都在发生全面的转型和变动,这就是我说的正在经历的知识第二次变化。

如果说 20 世纪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和知识社会背景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东方的”,就是中国和苏东的,它与“西方”截然相反或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在把民主理解为根据某些普遍性原则进行参与,以及由对财富的高度积累导向社会化大生产方面,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区分其实始终很模糊。更不必说韦伯所谓“科层化”和“科学世界观”这两个现代化的主导方面和普遍性原则了。这就是为什么亨廷顿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看成西方社会内部的冲突。特别是,正如“冷战”一样,自由资本主义参与了对社会主义的“制造”。如果从历史上看,没有自由主义的海外贸易,所谓的门户开放,以及建立在帝国主义时代诸如“文明”、“野蛮”等价值观准则之上的“国际法”,中国就不一定会走上后来的历史道路。历史不是由哪一种力,而是由合力导致的。同样,在整个 20 世纪最重要的事实是,各地区和各民族以自己的实践同样地参与、改写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历史;世界历史由欧洲主导的历史,变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参与制造的多重的历史。现代性(Modernity)由“单数”变成了“复数”(Modernitys)。当代理论,比如后殖民理论使我认识到,问题不仅仅在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宰制,而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人和思想家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上下文以及特定的语境中,对这些话语进行改写和借用的“话语实践”过程。这两个过程(话语扭曲和话语宰制)在历史中其实是同时发生的。而这都造成了我们对整个现代知识形成过程和形成方式的重新思考,也就是,最简明地说,现代知识正是在 20 世纪这种全球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和正在形成着,它实际上无法从某处或哪一方(如西方)找到一个固定的本质。

我们如何理解“世界”，决定着如何看待知识。正是因此，萨义德的名著《东方学》(Edward Said, Orientalism)对于“东方学”这样一个学科是如何在全球互动和交往的现代进程中被构建起来的视野，才对我们今天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史”观念造成了冲击；这使我们不能不重新检讨，中国现代知识的谱系，比如“中国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相应的规范以及其固定的“本质”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变化与“世界观”的变化有关，不能不对它采取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的态度。

从大的方面说，中国现代知识谱系的形成，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是在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同时它又与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之间存在上下文的关系，并且表现为从中国特定的历史处境出发重建中国现代社会制度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知识谱系的建立，现代学科(术)体制的形成，一方面为现代社会制度的重建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它又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形成的，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

从这样一个学术史的立场去考察现代知识和知识的形成过程，并不是意味着这些知识对我们而言无效了，相反，它同样有效，这个立场只是用来反思和反对如下对待知识的方式：即把活的，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相关的知识抽象为中性的、普遍性的教条和相应的合理化的知识规范和知识制度，因为这不过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直接结果。今天去反思和考察知识以及学科在何种历史语境中产生、建立和制度化，为的正是在当代重建知识与社会的有机联系，而反抗那种把学术理解为孤立于社会之外的领域的总体的合理化进程。

只是在今天，许多人对中国终于走上了市场化道路而兴奋不已，却很少有人再去追究中国历史、现实和现代性的复杂性，稍有感喟也不过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慨叹，——特别是知

识分子,普遍地拒绝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传统进行反思,面对文化生产、社会分化和大资本与权力的日益结合等问题,既拒绝反省又缺乏分析和应变的知识准备,结果,在成为专家、精英的同时,日渐成为合理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和学院制度的奴仆。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过去可能是面对人格化的权力而慷慨陈辞,而今却身处一种合理化的、科层化的、技术化的“无人统治”之下而不自知,昨天可能是批判的斗士,而今天却成为新秩序的辩护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和知识分子有可能丧失了与社会的有机联系,成为日益封闭的合理化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对我而言,我自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案,我只知道激发讨论才能促成社会的有机联系和交往,而如果大家都认同了一种语言、规则和毫无差异性的表述,那么交往、对话、论辩乃至理解就成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的了。而它所造成并维护的是一个没有区别的世界。所以,今天应该思考的是,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作为专家、学者,而且是作为思想者的可能性,因为正如福柯所说,文化不是一种学说,一个教条,而是一种气质,一种生活方式,文化的方式是唯一关注知识的形成历史和知识的运用,以及它如何被运用的方式。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依然有效,尽管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应该丰富和改造,但却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无效了。这是当下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今天,中国的问题往往就是世界的问题,这是与80年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而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也许不得不再多说几句。在80年代,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开创者其实是重要的思想家朱光潜,我们在80年代都读他的书。80年代启蒙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是

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结合,最终的口号便是“人的解放”。对我们来说,就是青年人追求人生的意义和有个性有价值的生活,叛逆精神无所不在,换句话说那时候我们的确是热血青年。

此后,我们开始反省对待社会、历史和知识的简单化的态度,其实对一种人格化的统治进行反抗和采用一种人格化的反抗方式,造成的只能是一大批徒有叛逆精神而没有建设性思考的人。社会统治的结构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大厦,并且知识的方式也遵循了“事物的秩序”,孔多塞说过,“无疑,我们应当摧毁一切谬误,然而,既然在一瞬间就毁掉这一切谬误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应当模仿一位精巧的建筑师……他是知道该建筑的各部分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视野一直存在于知识的历史之中。实际上,当意识到思想、政治、社会和经济作为一种“结构”存在的历史性的时候,就会发现做一个追求思想、学术而且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献身于知识的历史的研究有多么重要。尽管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做专家,但是 90 年代初,我痛切地感到,对我们这代人而言,首先是做一个专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否则你就没有揭露那种虚伪的“专家统治”的能力,而只能变成一个盲目咆哮的纸老虎,而后者也只不过是另一种表演而已。

我是在那时(大约是 1990 年冬天)读了汪晖的长篇论文《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它与我当时正在反复读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发生了撞击,汪晖在那篇论文中提出了“五四”崩溃的内在原因:只有一个“态度的同一性”,“作为一个思想运动,它是在面对过去、反叛过去的激烈态度中形成的。‘五四’启蒙思想没有共同的社会哲学基础,从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逻辑体系,而启蒙主义的思想原则一旦离开了它的逻辑体系,也就丧失了它的明确的规定性”。

我把这些话也看作对 80 年代的刚刚逝去的岁月的反思。这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把思想、知识和社会经济当作一种有内在逻辑的体系进行研究的观点,事实证明,这一看法成为我自己和很多人后来重新思考问题的起点,尽管今天,可能汪晖本人的看法也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关于“人的解放”的看法,鲁迅曾说过“新世纪向我们要的是‘人’”,但他并没有说这即是一个“现代人”,他/她是一个“说话的人”、“工作的人”、“生活的人”,而现代汉语白话文、现代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五四”引进的生物学,都是围绕着现代人的这些方面构造起来,并且塑造着“现代人”。现代知识正是围绕着“人的发现”、“人的解放”的旗帜,构造着自己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形成了关于“人”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既对旧的秩序造成了冲击,也是新秩序的基石。因而关键不是空洞的“人的解放”,而是旧秩序如何转化为新的统治秩序的过程,这其实就是 60 年代福柯与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争的要害之一。记得在“20 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的讨论会上,我在发言中提到“从‘寻求富强’到追求‘人的解放’”的说法时,汪晖立即敏锐地补充,这种表述“有过分强烈的历史目的论的色彩”。这种敏锐无疑是在提示一种知识的立场。

当告别萨特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时,我们开始逐渐小心地与 80 年代中国“人的主体性”的启蒙思想拉开距离。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具体、细致地了解“秩序”如何生成、确立和转化,知识分子才能有所作为,批判和介入都不是依凭那种酒神式的激情和流于一种姿态,福柯这段堪称激进的话曾反复被引用,但在此我还要再引用一次:“我认为对于经济、政治和思想结构用以运转的方式的严谨的理论分析是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只要这种政治活动是一种操纵,或是改变、动摇和转换结构的一种方式。……我不认为结构主义是知识分子闭门空想的独

家理论活动；我认为它能够，而且应该同实践相结合。”更进一步说，“我认为结构主义应该能够为任何政治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政治并非一定是不可知的”。

一个人无法选择生在什么时代和地球的哪一面，正像我命定地生在 60 年代中期的中国。如说每个时代的文化有其特殊性的话，那么我便无可避免地是中国现代性矛盾极端爆发时代的产物。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由于当今世界的“进步”无法摆脱种族和文化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而如果时至今日强势的话语也拒绝承认偏离资本主义的原初形式而进行的思想，那么我就甚至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我不以为这就是堕入“合群的自大”。尽管有人把民族国家看成是西方霸权话语的产物，但是，我还是看不出二战期间诸如法国的抵抗运动和中国的八年抗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法西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有什么相同之处。问题不是话语本身而是它如何被运用，而作为知识分子你在所有的关头是站在强势的一边还是抵抗的一边。

而且今天的情况也许不是全球一体化还是民族国家化，而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权力采取的形式，它与跨国资本的结合方式。这种交织的图景迫使我们采取更为复杂的分析立场，但是，严峻之处在于，经过革命的标准化和市场的标准化之后，呼吁复杂的声音越来越听不到了，你的立场成了非此即彼。

比起“上一代”和“下一代”而言，我们“这一代”面对的是一个交织复杂的时代，面对这种时代承认没有一个既定、现成的方案和道路供我们遵循搬用是清醒的态度，而用某种方案和道路去套它则是糊涂和自以为明白的态度。如果说经验主义的方法是强调理论的精确性可由假设与事实的一致性而得到检验的

话,那么我既不是预言家也不是经验主义者,我认为我们工作的使命是发现现代世界自身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的理解,而不是预言和检验。

也正是因此我们才有我们的压力。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 Lester R. Brown 所说的,“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跃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中国若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为人仰慕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而当我们面对跨跃传统与现代性这一我们的前人也面对过的艰苦命题时,却又不能不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知识储备如此的不足,因此,就不得不时刻反省自己有没有一个复杂的分析所有问题的能力准备和耐力的培养。毋庸讳言,我们深知,如果我们这代人再因为“不成熟”而铸成大的失误,那么问题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 20 世纪历史重演一遍了。

“士不可不弘毅”,到两千年纪元我自己 35 岁,那也算是半辈子了。倘天能假我们以磨砺和机缘,使我们能及时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使我们的工作得以进展,我愿时刻铭记一百年前曾文正的颇有士大夫气的名句:

“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

士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

——力虽不逮,而心向往之。